

向继东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2006

CHINA 2006
THE CREAM OF
CULTURE & HISTORY

2006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CHINA 2006

THE CREAM OF CULTURE & HISTORY

向继东 ◎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向继东编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12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7-5360-4920-X

I. 2 II. 向…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9516号

责任编辑: 海 帆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南海区盐步河东管理区南井)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2.375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书 号	ISBN 7-5360-4920-X/K·123
定 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序

向继东

去年编“文史精华年选”时，我自定的标准是：不要“戏说”，不要“故事新编”；要么有新的史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这种选法读者接受吗？没有把握。新书上市不久，本书责编海帆收到上海读者虞先生的来信说，他“买到《2005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回家后花了三四天时间，应该说精读得认真而细心，深感其思想意义和文史价值所在。这样令人深长思之的文史选本今年总算荣幸买到，因此我要向您及其他编辑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虞先生还说，本书“所编选的 40 篇文章，恰切而精当，涉及到中共党内外及国际共运与苏联东欧国家诸多方面，其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应使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青年人反思再反思。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读懂马克思？读懂列宁？读懂毛泽东？读懂邓小平？我虽然从中学语文教师岗位退下来了，但我能为 21 世纪中国真正实现小康和谐的社会贡献些什么……”说实话，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能碰上虞

先生这样的知音，心里自然感到一丝安慰。

今年选稿标准一样，只是方方面面重视了，所选文章，反复斟酌。我不敢说，这个选本一定比去年的好，可能它会让喜欢故事的读者有点遗憾，但对愿意思考的读者来说，它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所谓“可读”，并不是说书里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内幕揭密，它只是尊重常识，或者说提供了一种价值参照。

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看法，这不足怪。见仁见智，往往使人增长智慧和见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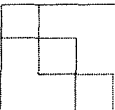
如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历史也不会因为遗忘而抹去一切。有许多事，你越是想忘记它，它越是流传着。民间渠道，口耳相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口述历史走红，究其原因，也许它更接近真实吧。

前不久，读到叶永烈谈如何做口述历史的文章。叶说他至今“保存着一千多盘录音磁带”，这很让人羡慕。如果他愿意，把这些录音老老实实整理出来，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因为他采访的那些人物太重要了，大都是中国当代史的知情者。那些原生态的东西，肯定是片面的，但片面也是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远胜于那些宏大叙事。

编辑这本年选时，正是我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2006年10月26日母亲走了，她一字不识，却说过一句让我不得忘记的话：“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其实，岂止是“成人”？成人成事都一样啊。也许，自由自在永远是可求而不可得的。呜呼！

2006年11月30日于长沙



目 录

向继东 ◇ 序	1
孙 郁 ◇ 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1
尤小立 ◇ 人生败笔:学者章士钊从政困局	8
吴立昌 ◇ 1930 年前后之《新月》	13
刘兴雨 ◇ 鲁迅为何不去苏联	24
智效民 ◇ 胡适苏俄情结的变迁	28
邵 建 ◇ “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31
张仁善 ◇ 1949:旧政权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39
谢 泳 ◇ 从范文澜的一封信说起	56
徐 鲁 ◇ 徐迟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60
张建安 ◇ 赵丹最后的日子	66
钱理群 ◇ 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75
魏邦良 ◇ 乔冠华与胡风:同饮一杯绝望的苦酒	81
李新宇 ◇ 寻找刘明铤	88
冯锡刚 ◇ 郭沫若与章士钊	95
狄 马 ◇ 纪念巴金的什么	111
晓 风 ◇ 一个“反革命钦犯”女儿的遭遇	116
王培元 ◇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123
彭燕郊 ◇ 我所经历的 20 世纪	132

徐庆全 ◇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忆向阳》何以前恭后倨	141
蔡 瑛 ◇ 汪曾祺的“滑铁卢”	162
陈四益 ◇ 像教的消息	168
袁伟时 ◇ 中国铁路：与世界艰难接轨(1863—1949)	172
胡文辉 ◇ 古典今情中的施琅	192
傅国涌 ◇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200
王重旭 ◇ 慈禧是怎样挪用海军经费的	208
向继东 ◇ 李鸿章这个人	212
汤伏祥 ◇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218
魏得胜 ◇ 掉进酱缸里的古德诺	225
林冠珍 ◇ 不该忘记伍连德	233
梁漱溟 ◇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239
杨天石 ◇ 蒋介石的另一面	248
余世存 ◇ 男儿事业有戴笠	256
孙玉祥 ◇ 为什么吓唬我们	261
沈延生 ◇ 重新认识“旧社会”	264
于光远 ◇ 我所知道的江青	267
李 杨 ◇ 张申府：中共黄埔第一人	281
李冰封 ◇ “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	290
于光远 ◇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297

金 凤 ◇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300
何 蜀 ◇ “文革”中的“语录仗”	307
罗银胜 ◇ 头发上的文化革命	312
朱鸿召 ◇ 长征,前所未闻的另一面	315
葛渭康 ◇ 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321
史义军 ◇ 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	335
邵燕祥 ◇ 希特勒的伎俩	338
郑异凡 ◇ 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	340
述 弢 ◇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	348
朱 正 ◇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	354
闻 一 ◇ 克格勃首脑叶若夫之死	366
葛剑雄 ◇ 真正的归宿	380
郑溢涛 ◇ “戏国”的悲哀	383

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孙 郁

有一次张中行先生对我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是，一个趋于信，一个止于疑。初听此话，我诧异了半天，虽然不能全部信服，但觉得还是讲出了些道理的。我的不能全部苟同张氏的观点在于，其实内心也隐隐认为，鲁迅也是个多疑的人，并不像人们看的那么简单，归于了什么信仰。在我的看法里，两人一个守于象牙塔里，一个在书斋之外。起初好像在一个起点上，后来各自东西了。有趣的是，这一里一外，看似有别，但他们在一些地方却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

以对日本文学的态度而言，周氏兄弟在许多地方意见是一致的。1923年6月，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有夏目漱石、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人的作品。周氏兄弟对上述诸人的作品是喜爱的。夏目的机智从容，有岛武郎的悲悯，芥川的幽默哀婉，我们在中国的小说家里尚未见到。他们急切地介绍这些，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至少说是想让国人得到一点启示，小说还可以这样来写！此后他们依然不断地注意岛国里的艺术，时常将这些转换到自己的

思想里。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里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彼此的兴奋点各自有别了。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对这个国度的文学有独特的阐述，资料与观点殊为精妙。周氏谈自然主义与写实派的小说，多有会心处，一看就是深味文学内蕴的人，文中有不凡之气。我读这篇论文，很是佩服作者的眼光，他能从人性和新的审美的角度看日本文学的新风景，可说站在了与日本作家同样的高度上，丝毫没有排斥的心理。勾勒小说的特质时，又能有史家的气度，仿佛是个日本的批评家。但周氏并不是就日本来谈日本的，目的是批评中国文学的不发达，用此引起世人的注意。文章的结尾写道：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很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我们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脱化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

写这篇论文时，鲁迅和周作人正生活在一起，观点是相近的。

奇怪的是鲁迅没有发表这样的论述，而是默默无闻地在从事着模仿与创造，那时就有了《狂人日记》的出现。小说明显是模仿了果戈理和安特莱夫的某些篇章。通篇并不幼稚，按严家炎先生的观点说，现代中国小说，在他那里开始，也从他那里成熟。周作人企盼的新小说，可以说在其兄的劳作里出现了。

从理论上自觉地思考一个问题是一种境界，思考后不是把它放在书架上，而是将其变为改变世界的冲动，将其物化在曾是盲点的地带，那是更高的境界。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把我们这些俗人甩在身后，现在大概还没有人追得上他。

二

因为知道木山英雄先生是周氏兄弟研究的专家，我曾特地向他询问过一些材料。20世纪50年代他去访问羽太重久，了解周氏兄弟的情况。羽太说，鲁迅见到人时很热情，善谈，给人亲切之感。周作人则不太爱讲话，陌生人不好与之交往。这也证实了我过去的猜测，鲁迅有趣，幽默而有性情，周氏则缺少与尘世周旋的机智，于是只好退回到书斋里吧。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看，鲁迅适宜去做拓展空间的实事，将愿望落到实处，周作人至多不过是务虚的思考者，描描天气，说说掌故，和田间的劳作者是没有关系的。我看两个人的特点，觉得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后来的文学，是沿着两人不同的道路分离开的。

谁都知道，鲁迅和周作人是民俗学的提倡者。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与两人关系甚密。周作人是理论上的建设者，一生力介弗雷泽、安特路朗、葛理斯的理论，以为在民间的土壤里，才有文化的本源。中国的正宗文化是官的文化，不过是权力者意志的体现，可吸取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有时等于通篇废话。但我们到乡间去，那些口头传说、歌谣、戏曲则有诸多美妙的情调，周作人在风俗与传说里看见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这正是旧式文人不注意的内容。你看他谈风土、神话时的兴致，好似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因为那里隐

含的正是集体无意识的东西。研究文化，就不能不关顾这些。我注意到他多年来潜心于此的耐力，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民俗学的学者涌现了出来，其功不在一般文人之下。而鲁迅不同的是，深知问题的重要之后，却在创作上下功夫，在小说和随感里展示着精神里的景观。我有时对照两人的文字，不禁会心一笑。周作人强调的文化人类学的隐喻，在鲁迅那里竟出现了。文本中折射的谣俗因素颇多，现代小说家中他是第一个民间风景的打量者。

谈狐说鬼在一些人眼里乃旁门左道，抑或堕落云云。周氏兄弟却偏偏喜欢这样。只不过一个从学理上引经据典，一个将此外化到文学的画面上来。在学理上，周氏的眼光我们有时不能不佩服，他对那些西洋人的著述颇为了解，每每有新奇的发现。他经由安特路朗进入神话及社会人类学，发现民风大多是古代蛮风的遗传，今人身上还留有远古的习俗。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的影子里。了解自我，有时就不得不往古里找找原因。鲁迅的看法与此接近，他不在理论的层面理解这个问题，而是从实际观察里得出结论，在形象可感的画面里，昭示着历史的投影。他写故乡的鬼气，阴魂里的咒语，我觉得比任何一个中国的民俗学者都要高明。那里浓缩着诸多意绪。对社会和旧时代的解析，不仅令人生叹，重要的在于，也给研究者留下了思想的空间。周作人晚年为鲁迅小说写注解式的文字，倒是说明了这一点。

不妨这样说，兄弟二人中，一个是理性的自觉者，一个是实践的自觉者。而实践在那时更为艰难、不易。我总觉得鲁迅考虑问题时比周作人要复杂。比如吧，写小说时，不像后来的茅盾那样按着一种理论去构思图景。他一方面把自己燃烧在里面，内心的苦楚喷吐而出。同时又用通天之眼，雕刻芸芸众生的苦运。他在民俗方面表现的意象，其丰富性是远远在周作人之上的。高远东先生在描绘《祝福》时写道，那是一篇儒道释吃人的寓言。鲁迅在鲁镇这个世界里虚构的场景，是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缩影。一个感性的画面里透出的信息，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有广度和深度。我有时在读完鲁迅的小说后，感慨道：周作人于小品文里苦苦期待的东西，竟在鲁迅那

里看到了。就思想的广度而言，鲁迅超越了周围的人们，因为深深植根于乡俗的土壤里，传统中阴暗的、负面的东西都出现了。今人说鲁迅的作品有深远的价值，其实就因为折射出民间的本然，乡民与弱小者的世界，是真的、未被士大夫篡改的世界。

当读到《女吊》这类文字时，那乡间的人而鬼、鬼而人的气息，真是惊心动魄。在非主流的文化里，其实有着民众活的、血肉相间的存在。文人雅士的歌咏何时光顾到这个世界呢？中国历代文人不太注意世俗的亚文化，以为卑下无聊。但鲁迅却于此发现大的悲欣，他在那里才找到文化里生动的遗存。不过那寻找是身临其中的，身上也带着泥土和血气，不像周作人那样高枕无忧的休闲状。周作人将思想、审美与己身的愉悦结合起来，是雅人的空灵与智慧。鲁迅有着自己的空灵和智慧，却不去躺在榻榻米里悠然自乐。他像一只田野里的狼，叫出了黑夜里的惊恐，也叫出了一个民族的哀凉。没有办法，他在内心深处，要和黑暗里的存在一同存在。

三

翻历史的书籍，如若认真的话，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看法，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有时还需从书本里出来，看看生活方式如何，怎样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职业和专注一种生活理念，大约就能了解一些问题，性情里的东西或许就能找到一些。周氏兄弟的差异有时是显示在日常生活里的。鲁迅一生一直在逃离家，从绍兴到南京，逃到日本后又从医学专业逃到文学里。回国后也是不断地逃，从北京逃到厦门，从厦门再逃到广东，最后逃到上海。至于住处，就有许多地方，一直处在变迁的状态。鲁迅给我的印象是一直和周围的世界对立着，最后只好逃到自己的园地，和四面的世界搏击着。周作人的生活选择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在柔软的烟幕后和这个世界对话，并不让外力去伤害自己。那结果就是一个不断换着方式与世界捣乱，一个能忍耐着苦楚，苟且乱世亦可自娱自乐。我们讨论两人的人生，从此角度也可走进更深的景观。

1919年底，鲁迅和兄弟搬进八道湾后，周作人几乎一直住在那里，除了入狱几年外，他没有离开自己的书斋。对于鲁迅的行踪，周氏不以为然，以为是和青年们鬼混，跑到文化的漩涡里，未免不是趋时。周氏的讥讽长兄，有恶意的地方，也有不解的盲区。他不知道鲁迅那时最大的渴望是和新生的群体造就一支新文化的队伍。周作人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断地找精神的灯火，鲁迅却是在民间用生命之躯自燃自烧着。早在厦门时，他就渴望到南方后和创造社的人结合起来，造一新的战线，做点有趣的工作。但后来发现那不过是个幻影。他最初逃到南方，用意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不久就感到先前的设计有些乐观了。在职业的选择上他是痛苦的。做教员呢还是自由撰稿人？前者会抑制文学的想象，慢慢地变得有点匠气了。后者也是个挑战，没有任何保护伞，一任自己的漂泊。鲁迅的问题是，难以和周围的世界和谐，很快就发现周边的一切与自己是对立的。他在厦门和顾颉刚的冲突，其实在一般人那里不会弄到这个程度。在鲁迅眼里，顾氏不过是现代评论派的喽啰，眼里只有胡适之类的名人，其实不过是渔利啖名的酸文人。鲁迅讨厌的学者与教授许多是周作人的朋友。比如也是那个顾颉刚，周氏对他是客气的，在自己编的《语丝》上登过顾氏的许多文章。顾氏是钱玄同的学生，而钱氏乃周作人的畏友，彼此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我常想，鲁迅的讨厌这些士大夫气的文人，可能是觉得这些人只会爬在地下，看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事物，眼界窄窄，却自以为是。他在这些人身上嗅出的都是些熟悉的气息，哪有什么冲荡的韵致呢？离开他们，也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晚年的鲁迅身边集聚着许多新的青年面孔，搞文学的，美术的，都有一些。查书信和日记，每年都有新雨旧朋相聚，而新识者为数是众多的。但八道湾的周作人身边的人依然如故，永远是那一类的学者，或者是气味相近的几个弟子。对比两人身边的文人可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鲁迅那里野气的、挑战气的人多，所以他能有萧军、萧红、瞿秋白、胡风、冯雪峰式的朋友是可以理解的。在周作人那里，必然会有废名、俞平伯式的学生，如果废名每日出现在鲁迅那

里，我们就会觉得有些不对了吧？鲁迅周边的人真而又喜欢搞乱，似乎是向上的太阳，喷吐的是热的气浪。而八道湾那里如日暮屋下的茶舍，是袅袅的茶烟，散出清而浓的诗味。彼此的差异，很让人思之再思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5期）

人生败笔：学者章士钊从政困局

尤小立

读《章士钊传》（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始终困惑于 1924—1926 年传主本人的从政入阁。在章士钊一生中，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

善交游，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点。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总体上看，要么是有人性、学问之人，要么是革命家、政治家，要么就是有权有势有利的权贵。他在这些人面前虽直言以谏，但终脱不了传统谋士、清客一类的角色。这些人成就了章士钊，也让他进退失据。

段祺瑞即是一例。论者以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传统的交友之道和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两个理由均是章致他人信中的自我辩解，本身就令人生疑。其实，在关键问题上章本人也自相矛盾。如他给吴稚晖的信中，称与段并无交情，但在致章太炎的信中，却又说受其恩惠。

在《答稚晖先生》中，章士钊说他与段祺瑞是“一见倾心”。但观章氏一生，能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并不多见。数起来大约都是些权贵或者领袖级人物，如张学良、杜月笙、宋哲元以及解放后的毛泽东等。章士钊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受到他们特别的重视和百般的照应是肯定的。但在他本人，总是处在“被养”的境地。梁漱溟所说“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

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又附记》，《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7页），一点儿也不假。人到中年后，章士钊生活上的传统贵族气，气质上的腐朽气，多有显露，现实地看，这也让他不能不有所依附。

章士钊入段祺瑞政府，确实有他所谓“小行其志”（章语）的企图。但成“帝师”，辅佐“段执政”之心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仅是在为段找到“执政”这个名义上，他立下了头功，就是以后，他也极尽犬马之劳。段祺瑞让章一身兼二职（司法、教育总长），体现出的是充分的信任，而他的努力配合，也让段祺瑞执政府得到巩固。他们彼此配合得不可谓不默契。1925年的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教育部禁令，1926年的“通缉令”，或与之有关，或直接出自他之手，这些看起来是身不由己，但自主的成分，也还是有许多。

章士钊入阁履行政务，可以说让他内在的守旧气质显露无遗。作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于现实中却全无此精神气质，确实令人费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骨子里的传统专权意识未脱，而人性中的弱点，也助长了这种传统的劣根性。

1925年章任部长的教育部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的禁令下达后，连当时的报纸，也急呼看不懂。因为十年间，章士钊变得实在太快。《晨报》有时评说：“总观昔日章氏之见解，与吾侪若合符节，何其一登国席，便以有碍邦交，不许国人公然反对二十一条，又何以借口士习嚣张，抑制学生公然活动，此吾侪翻读章氏十年前旧作，所以不胜今昔之感也。”（转引自《章士钊传》，第208页）

其实，这样做，对章也是履行职责，他身居要职，在那样的“执政府”中，是没有义务向下负责的，这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治道。他只是向上，也在向平行及当事的部门（如京师警察厅）负责。于是，牺牲者只能是学生。

之所以涉及人性的弱点，是因为学生们抄了章的家，还不止一次。这也让章士钊与学生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他本人的犟劲儿